

# 清閑與戒懼—從陳繼儒見晚明文人心態

涂柏辰

## 一、山林閑雅與妙語清談之展示：陳繼儒清閑外貌展示

### (一) 山林隱逸與藝術生活展現

明中晚期，山人以山居隱逸形象示人，然正如陳繼儒於《巖栖幽事》中自云：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飢，四不能。乃可能者，為嘿處、淡飯、著述而已。<sup>1</sup>

其所欣羨的生活非山中自力更生的夷齊式貧苦生活，反似自魏晉竹林七賢以降至元末明初的倪瓚、顧瑛的林下優遊風尚的清閑優雅山居生活。既不放棄世俗享樂，復坐享隱逸高名，如錢謙益評陳繼儒「聲華浮動，享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sup>2</sup>被時人譽為比美南朝梁陶宏景與唐代李泌的山中宰相。<sup>3</sup>陳繼儒以山居生活示人得享高名清福的特色，在乾隆時人蔣士銓「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筆下，<sup>4</sup>一語點出此一特色。這種以山林隱逸為幌子，利用時人對傳統風雅文化的欣羨，推動閑雅文化，此一山林優遊清雅流行文化正為中晚明社會風尚的特色，亦為山人群體中的山人文化核心。<sup>5</sup>

<sup>1</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收於《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1冊，頁8a。

<sup>2</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638。

<sup>3</sup> 出於「陳徵君繼儒宅門有額，曰山中宰相」，見王澐著，《雲間第宅志》，收於《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564冊《藝海珠塵》13，頁5b。

<sup>4</sup> 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齣，〈隱奸〉，頁19。

<sup>5</sup> 關於中晚明社會風尚研究，近年來諸多學者多於此領域有所斬獲。如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頁1~54、〈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17：4，2006，頁73~141、〈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明代文人社群的凝結與文藝社會的發展〉，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二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03.23~25，頁1~45，等文章。在士人文化上，以任俠、雅文化、藝術生活經營等子題為主，描繪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社會，文人在當中以詩文優遊其中，透過文人之間的相互交遊，架構出一個以文人文化為主的流行文化。把中晚明雅文化的流播作一論述，本文擬從這些基礎上，以山人這一群體來重新詮釋文藝社會與當時文人交遊結社的情況。在關於社會文化上的好古仿古消費風尚，以巫仁恕的消費文化為主，見巫仁恕，〈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8，2002，頁1~70、〈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頁87~144、〈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向與新問題〉，《新史學》17：4，2006，頁217~252，等文章。藉著市場仿古風氣與文人好古風來看雅文化如何被消費，同時這種消費文化又如何促進了社會上對於雅文化的狂熱；

當中陳繼儒以表現喜談種花植樹、安穩本色的生活方式，顯現出一股清閑之風。既看不出為生活所困的貧苦，亦無仙家修仙的飄然，著重花草栽植佈置，以淡雅為主。如：

余輩膠粘五濁，羈鎖一生。每憶少年青松白石之盟，何止浩嘆！……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鍊吐納，以晷餘年，即佛藏六千卷，隨讀隨輟。惟喜與鄰翁院僧談接花藝果種秫劂芩之法。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sup>6</sup>

而繼儒亦以山居有八德勝城居，說明山居清閑幽靜的好處，如：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服馬驛也！<sup>7</sup>

當中體現的山居生活並無傳統山居清貧寂苦、足不出戶的景象，反而以山居清閑幽靜、少受俗人打攪的悠閒生活景象為重，強調山居的清靜閒適。故其山居生活特點在於意境呈現，旨在呈現一種平和沖淡的氛圍。如：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杓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sup>8</sup>

由上可表達出繼儒以淡宕悠閒心境去體會生活中的悠閒風雅意境。

陳繼儒嚮往隱居形式為林下幽遊之風，極欣賞嵇康、王維、白居易、蘇東坡、趙孟頫、倪瓚、顧瑛等高士。在《巖栖幽事》中，即以嵇康、倪瓚林下幽遊為榜樣，以高士自詡。<sup>9</sup>在塑造林下幽遊高士風範上，繼儒以清雅飄逸為主要表現形

---

在文人旅遊中，則藉著文人的旅遊方式與描寫，表現出當時文人好遊之風。本文打算就文化市場的消費觀念來深入討論山人於其中的位置，與山人對江南雅文化市場的影響。另有大木康在其《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都：研文出版，2004）裡提及江南出版文化的盛行與當時書籍傳播的關連，建構出一套出版市場的通路出來，並且利用媒體傳播觀念來看此時的出版文化；以及金文京一系列關於山人相關論述，主張從事專門技藝與干謁手段的才是山人，並且利用當時山人的活動來與政治經濟作連結。最後，張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可說是大陸學者山人研究中，算是把山人作一總結與系統整理的一部著作，雖有細處的遺漏，然而對於山人的大觀念掌握可謂有所貢獻，而諸如李斌的〈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學術月刊》38：6，2006，頁142～147、夏咸淳的〈論晚明隱士陳繼儒〉，《天府新論》117，2004，頁131～135、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9，2001：1，頁8～16，都對山人團體與陳繼儒作一基本且不錯的介紹。本文打算著重陳繼儒清雅生活的體現，說明陳繼儒之所以為時人目為山人佼佼者，與山人文化至此達於高峰之經過，以其從另一角度觀看明中晚期的社會文化變遷。

<sup>6</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4a。

<sup>7</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4a。

<sup>8</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3b。

<sup>9</sup> 陳繼儒，《妮古錄》，卷4，頁13a。

式。在通過述說著經由細密安排山居生活佈置下，體現親古拔韻的雅風，以植花栽樹、杖入老林、竹林靜臥、觀古畫書帖等方式外露，向世人展示其清閑飄逸生活態度。如：

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亦天壤一異人！』<sup>10</sup>

其以藏異書表達對傳統士人藏書好古風氣之嚮往，又以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表達清淡意向，復以嘯咏其中表現魏晉林下風範意涵。繼儒在其全集中，有數量頗多的描寫山居田園詩作，如：

竹高樹深，谷窈（窈）泉甘，  
既安且閒，南山之南。  
俯仰百歲，消磨豪傑，  
何如此中，飲冰聽雪。  
裂石介嶮，老木陰廬，  
上德不德，左圖右書。  
簡欲剗名，休養生息，  
疏鑿畝畝，以樂賓客。<sup>11</sup>

詩中以描寫高竹深樹，深谷甘泉的山中景象，效法陶淵明種豆南山下的安閒意境，消磨一生。過著飲冰聽雪、圖書常伴左右、逍遙自在，並與同好相聚以樂的生活。藉詩歌表達自身對優閒意境的看法。又如：

久不出山中，信杖轉谿壑，  
壑泉鳴淙淙，回互抱峯嶽，  
絕壁鬚朱藤，藤花開復落。  
下有擁膝人，孤吟自如昨，  
此意誰與言？幽猿能領略。<sup>12</sup>

詩作中以表達山居幽人形象為主，通過敘述山居倚杖入深壑，立地絕壁間，獨身欣賞藤花以猿猴為伴，孤吟當中的幽寂，說明繼儒眼中的閑靜幽雅生活。另舉三則詩文，旨在表現山居清閑與幽雅，通過閒挂、閒揮、心手無事等詞語描寫：

偶搖白羽扇，

<sup>10</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6b。

<sup>1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影本），卷 27，四言古詩，〈山居集蘇帖字〉，頁 1a~1b。

<sup>1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7，五言古詩，〈山行〉，頁 19a。

閒挂青松枝。  
心手多無事，  
況欲秋聲時。<sup>13</sup>

閒揮白羽扇，  
一讀赤霄文。  
世外無生客，  
胸中有活雲。<sup>14</sup>

吾本山中人，  
愛說山中話。  
五月賣松風，  
人間恐無價。<sup>15</sup>

以上三首詩表達繼儒對山居生活的主要重心在營造閒適無憂的清閑境地。顯示繼儒山居生活的厥意與清雅。

從繼儒詩中可知其少描繪山居苦悶生活與躬耕日子，多以清閒悠然自得之感示人，想營造出一股山居清閒風氣出現。另如：

箕踞於斑竹林中，徒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弦，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間。<sup>16</sup>

表達出攤書隨觀、清閑隨意生活可比之羲皇上人與嵇康阮籍的林下幽游之風，以展現清閒風尚為主。另外，亦可通過山居舟游描寫，來看繼儒山居意境的安排：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櫂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菹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sup>17</sup>

上文表達既得舟游樂趣，又兼顧呈現閑雅意境，展示出脫俗又優雅的山居藝術生

<sup>1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新秋·其四〉，頁 4b。

<sup>1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山中雜詠 其三〉，頁 5a。

<sup>1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山中雜詠 其四〉，頁 5a。

<sup>16</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2b~13a。

<sup>17</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8a。

活，使陳繼儒山居生活成爲眾人模擬對象，成爲山人中的佼佼者。

在飲食上，亦以清淡儉樸爲尚，稱之爲山家清供，由飲食表現出山居生活的清淡高雅。如：

吾鄉苻菜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苻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于農田餘話。俟秋明水清時，載菊泛泖，膾鱸擣橙，並試煎法，同與蓴絲薦酒。<sup>18</sup>

又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牕，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sup>19</sup>

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蒼葡玉蘭可以醮麵，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茱萸可以釀醬，枸杞鹿蔥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蒞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笋脯之闕，此山癯食譜也。<sup>20</sup>

以上皆表達所謂山居清雅飲食的標準，即爲不嗜奇珍異物，在山林田野中尋求常人所不知的清雅風味。故在敘述中常以郡志不載、爲山林野人所食等用語來強調其獨特清淡風味。利用飲食來宣揚清雅文化意境的塑造。

總之，繼儒的山居生活是以清閒優雅爲主，試圖營造一種藝術美感的生活境界，以向世人展示飄逸悠閒的內涵，進而用以展現自己。然此類以清閒飄逸示人的隱逸生活，實與山人汲汲生計奔波塵世形象不符，又與繼儒自身四處館授遊玩形象衝突，這亦爲時人對山人一大詬病，也是山人現實與矛盾的苦處。因此有生活藝術化佈置與強調心美感體驗的言論出現，如：

位置之法，繁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sup>21</sup>

上文強調位置擺設可以呈現出個人品味，透過擺設可知個人的韻味境界。因此韻士所居不必定在深山野壑，只要屋內擺設的得當，也能體會出高雅絕俗風骨，體現幽人高士風致。

這套位置擺設論以陳繼儒最爲著名，其以佈置閒雅清淡又不落俗套聞名，又因名氣甚大，故有「陳眉公每事好制新鮮，人則效法，其所坐椅日眉公椅，所制

<sup>18</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7a。

<sup>19</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7b。

<sup>20</sup>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23b。

<sup>21</sup>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 10〈位置〉，頁 411。

巾曰眉公巾，所食餅曰眉公餅」，<sup>22</sup>以眉公名稱之，以高雅新樣有古意博得市民喜愛。另外從蔣士銓譏諷陳繼儒的記載中，可得出繼儒受歡迎的程度。如：

把飲食衣服器皿各件東西，設法改造新樣，騙那市井小人，遂至財源滾滾，所以古有東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馬桶。<sup>23</sup>

而在生活佈置方面，旨在依據擺設位置，呈現好古文化意境，如：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香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化離。以此引類連情，趣多合。<sup>24</sup>

賦予花文化意涵，藉不同種類的花體現傳統士人風雅文化意境，表現一種藝術涵養。藉花的擺設事宜，賦予花文化意涵，從而建構一種文化藝術空間。另外，繼儒也藉述說雅文化生活的準則，以展現清閒優雅的品味，如：

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喧、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右皆一人獨享之樂。<sup>25</sup>

以上述諸事為一人獨享的樂趣，藉指定某些行為並搭配文人傳統文化意涵，說明此為雅事，行此動作並仔細品嚐當中意涵即為優雅文化實行者。與：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sup>26</sup>

更進一步賦予物事特定文化意涵，以視此事物時即為品嚐優雅意涵。表達自身對於優雅文化看法。然而，在清雅優閒生活蔚為時尚時，即有人附庸風雅，但又東施效顰，以致出醜露乖。如：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

<sup>22</sup> 柴萼撰，卷 35，〈眉公馬桶〉，《梵天廬叢錄》，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 十七編》（台北：新興書局，1977），頁 6391~6392。

<sup>23</sup> 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第 2 齣，〈隱奸〉，頁 19。

<sup>24</sup> 陳繼儒輯，《太平清話》，《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 21 冊，頁 17b~18a。

<sup>25</sup> 陳繼儒，《太平清話》，頁 18a。

<sup>26</sup> 陳繼儒，《巖栖幽事》，頁 2a。

奇態而反平者。<sup>27</sup>

亦有認為：

談山林之樂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厭名利之談者，未必盡忘名利之情。

28

表達繼儒對附庸風雅者口是心非之譏諷，以為這些人尚未領略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涵。經由上述論述，由此通過對文化意境的掌控，詮釋雅俗之別，以確立自身對清閑文化生活的主導權。

總之，繼儒在眾多山林論述中，把重心放在「清」、「趣」二字，在對外展現的過程中，常以清閑優雅形象示人。如：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sup>29</sup>

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崗阜迴複及林水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苑為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也。<sup>30</sup>

由上可知，繼儒以此展現出一種幽遊山林之風。但於物品擺設與器物鑑賞中，又處處可見唐宋文人鑑賞風雅習氣，成為經由賦予物品文化意涵，通過佈置呈現如畫氛圍、好古意境，成了既適用文人雅士表現風雅的媒介；也滿足大眾附庸風雅的形式。這應是繼儒會如此有意無意地提及山林生活與物品藝術化的原因。透過展現山林隱逸氛圍，既受士夫青睞，復與時人崇拜山林優雅文化相契，使繼儒成為山人佼佼者，並且使山人在山人文化的推行上引起社會極大共鳴。故可認為陳繼儒的山居生活為一展現自己清雅生活以強調自身隱士飄逸意向之手段。

## （二）清言小品與談玄風尚的清態顯示

明中後期，由於政權紛亂不斷，內廷與外廷相互傾軋。又發生閣權與部權相爭、憲臺與閣權相鬥與宦官亂政等事，使士人心境趨向對政治失去熱情。加以中下層士子因久困場屋，謀生不易，紛紛外出干游以養家，適逢此時江南經濟發達，造成文化事業蓬勃發展，使出版文化鼎盛。故山人提倡的山林優雅文化大為流

<sup>27</sup>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寶顏堂秘笈》，第22冊，頁8a~8b。

<sup>28</sup> 陳繼儒；李竹君、曾楚雄、翟霞注，《小窗幽記》（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卷1〈醒〉，頁6。

<sup>29</sup> 陳繼儒，《巖栖幽事》，頁25b。

<sup>30</sup> 陳繼儒，《巖栖幽事》，頁26b~27a。

行，出現許多清言雋語小品，這也反過來更確立時人對清雅優閒文化的推崇，使清態成爲山人標榜外在行爲以博名高的手段。

這方面以陳繼儒表現堪稱清言小品典範。繼儒以展示其山居閒雅面貌，透過清言小品與出版傳播，使其隱逸山林、清雅閒淡形象爲人知曉。如費元祿描述陳繼儒所言：

負一代盛名，立志高尚，著作等身，……語帶煙霞，韻諧金石，醒世持世，一字不落言筌。揮塵風生，直奪清談之席；解頤語妙，常發斑管之花。所謂端莊雜流離，爾雅兼溫文，有美斯臻，無奇不備。<sup>31</sup>

可知繼儒在時人眼中乃是以通過清言流傳，表達自身意向與系統地展現清談玄遠的林間高士形象示人。又繼儒也通過許多清談表達對雅俗生活與林下高士風範論述。如：

淡薄之守，須從穠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堪過。<sup>32</sup>

藉淡薄性格須從濃豔地方試驗，用以說明市隱、心隱論述；鎮定操守則須看破紛擾環境，說明鎮定之操也能在紛擾環境中得到的。用以說明並非定要在山林中才能有淡薄鎮定操守。又：

書圖受俗子品題，三生浩劫；鼎彝與市人鑒賞，千古奇冤。脫穎之才，處曩而後見；絕塵之足，歷塊以方知。<sup>33</sup>

山栖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鑒賞是雅事，稍一貪痴則亦商賈；詩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稍一為俗子所撓則亦苦海。<sup>34</sup>

上二條以雅俗分別爲主旨，以本屬文人雅事的書畫鼎彝鑑賞，受俗人所仿效，即爲俗事。與批評當時過渡附庸風雅風氣，以爲不可太過沈溺當中，要保持若即若離的清雅飄逸態度才可。而繼儒亦通過由細緻近乎瑣碎的場景編排，表達理想優雅清閑的生活環境，清晰顯示生活佈置圖像。如：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樸；亭後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蔭有草，草欲青；草上

<sup>31</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序文，頁1。

<sup>32</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2。

<sup>33</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7。

<sup>34</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8。

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歸。<sup>35</sup>

藉著由遠至近的場景編排，加上山居閑適情景之表述，清楚描繪出一幅山居幽遠淡雅之生活圖繪。

通過清言小品描繪自身形象的手段，在陳繼儒身上可見到多重展現。如：

先生架學區中，揚才甸外，婆娑經典，不求浮世，人知放浪形骸，且寄高文，自探量晴雨，時出名言，間參禪妙，如是而已。<sup>36</sup>

可見到繼儒以飽讀經典，適世不避世形象出現。參照前面欲藏萬卷異書的異人形象，可知繼儒以異人、不羈的形象出現。另一方面，繼儒復以談清說玄的清談家身份廣為人知。如：

草色花香，遊人賞其真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sup>37</sup>  
竹外窺鳥，樹外窺山，峰外窺雲，難道我有意無意；鶴來窺人，月來窺酒，雪來窺書，却看他有情無情。<sup>38</sup>

斜陽樹下，閑隨老衲清談；深雪堂中，戲與騷人自戰。<sup>39</sup>

透過遊人、達士賞悟與窺境描寫，及與深山老衲、詩人騷客相清談、相戲，表達世外之感以凸顯自身飄逸清雅的高士面貌。繼儒也藉與他人對答形式，表達清談風度。如：

客過草堂扣余巖栖之事，余倦于酬奮，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sup>40</sup>

藉客問主答形式，仿效《世說新語》問答體，以得閒事外、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呈現清閑逍遙一面，復以研田耕耘書畫為利養終老，並以客相訪通名閒談

<sup>35</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6，〈景〉，頁111。

<sup>36</sup> 費元祿，《巖栖幽事》敘文，頁2b。

<sup>37</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21。

<sup>38</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3〈峭〉，頁48。

<sup>39</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3〈峭〉，頁52。

<sup>40</sup> 陳繼儒，《巖栖幽事》，頁3a。

為羲皇上人般悠游生活。

通過清談、清言小品所表現的雋語，繼儒一方面以此營造山林高士清新飄逸樣貌；另一方面又藉此對傳統山林文化進行改造，並運用其豐富文化內涵，使繼儒山林高士形象不致流於矯揉做作的表面形式。此種運用清談展現清態，以博高士名之手段，亦為當時山人群體求文名之常用手段之一。然而，若無深厚文化根基輔助，則清言、清談往往流於膚淺、矯揉，正如繼儒所說：

茶中著料，碗中著果，譬如玉貌加脂，娥眉著黛，翻累本色。煎茶非漫浪，要須人品與茶相得，故其法往往傳於高流隱逸，有煙霞泉石磊落胸次者。

41

以煎茶加料其中會翻累本色，適得其反。煎茶要與人品相配合，若非人品高尚、胸懷高人者，是不會泡出好茶的，等於把煎茶此事賦予文化意涵。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本色一詞，由於萬曆朝間李贄童心說與三袁性靈說一出，文壇轉而以直抒性靈、本色論文為主流，強調我手寫我口、用筆清新飄逸、新奇清爽，山人在當中乃為主力，其中以陳繼儒清言小品最為清新飄逸，為當中佼佼者。<sup>42</sup>

此外，亦與當時狂禪風氣、僧衲文人化有關，由於明中晚期學術漸向三教合流發展，故除僧人喜作詩不避世外，文人亦大多喜談禪理，並以與山人羽客高僧相清談為雅事，受到魏晉玄學談玄風影響甚深。然若與之相比，則少有精闢哲理論述，反多詩文唱和與禪法討論罷了。與魏晉談玄比較起來，明代清談反較像宋代蘇軾與佛印相交的那種戲謔、風雅氣息。繼儒憑藉清談與清言小品的表現舞台，展示其清閑優雅外貌，配合本身深厚文化素養，在崇尚山林隱逸理想下，以清閑為媒介，揉合魏晉名士風流與宋代士夫風雅文化，經由日益發達的印刷事業與山人小品文學發達鼎盛，建構一套以清閑優雅為內涵，日常生活與言行風度為外在表現，塑造高士逸民風範的遊戲規則。這一套遊戲規則經由文人、山人間相互吹捧，並為社會大眾接受，成為流行文化。

其中以山人為主力，經由一系列對山林隱逸、風雅文化、山居理想之敘述，一方面抒發心中隱世遯居山林理想；另一方面又以大眾尊敬山居清雅閑淡生活以博佳名，使山人為大眾所崇拜。當中，陳繼儒為山人佼佼者，大眾留下深刻印象，使繼儒名震江南。

接著，陳繼儒又透過清言小品著作流傳，推廣大眾對清雅文化的喜愛，並再次塑造己身為優雅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利用文名行出版清雅文化書籍與地方官員資助，以供生活所需，擺脫之前山人卑下地位。重新包裝自己，以山林高士、談吐玄遠形象出現，爭取大眾對山人之崇拜。從陳繼儒清閑優雅外貌下，蘊含了山人在之前為自身角色定位所做反省與嘗試，在陳繼儒身上完美融合清雅自持的心

<sup>41</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7，〈韻〉，頁132。

<sup>42</sup> 關於明中後期小品文興盛之因，歷來眾多學者皆已提及，大體皆認為山人為小品文主力構成份子。可參閱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與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等著作。

態與清楚知曉表演優雅的體悟，使陳繼儒能成為山人中的佼佼者與當時清雅文化的流行教主地位。

關於此點，站在批評角度的蔣士銓，在《臨川夢》第二齣〈隱奸〉中以陳繼儒「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名盡力誇，獼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鍾鼎潤煙霞」的見解最為透徹。<sup>43</sup>蔣士銓十分清楚明中後期當時社會背景，雖貶意十足，但仍把繼儒這種表演山林清雅外貌與著清言小品謀生情形描寫十分透徹。此種展示清雅外貌的特色正是山人文化流行一大助力。

## 二、戒懼心態——陳繼儒冷眼時局與畏謠心態

### (一) 八十年來履薄臨深：陳繼儒之懼

陳繼儒在他人眼中，一方面是山人文化實行佼佼者，獨領風騷，以清雅飄逸之姿展現於他人之前；然而，另一方面又以憂懷國事、履薄臨深、時時戒懼謹畏形象表現與他人書信往來或自身文集語句間。細讀其文集，多感嘆世人多訛言，並以士風多中傷他人為戒。如「聞京師謂太原二揭，弟為床頭人，此說極可笑！」<sup>44</sup>即以萬曆三十五年（1607）王錫爵密揭案中，繼儒遭中傷，認為密揭乃繼儒替錫爵草擬，並說繼儒在錫爵任首輔時，與之同住京師官邸，為相門山人，操弄朝政；<sup>45</sup>亦有書中提及陳繼儒因厭惡湯顯祖對其譏諷，使之落榜一事；亦有說明毛文龍被殺與得罪陳繼儒相關。<sup>46</sup>

這些事件實與當時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明代自嘉靖以後，講學成風，士人言路大開，形成一股輿論壓力。然而在經過張居正的箝制言論、毀書院、禁講學後，言路逐漸走向激昂，漸被利用成黨爭工具。故有妖書案、續妖書案、山人蜚語案等，到了天啓魏忠賢亂政，政治愈加黑暗，言路受壓迫與沈默，使士人對政治漸趨失望。到崇禎時，由於剪除魏闖，言路為之一新，而有激昂救國言論出現，且愈到後期，經世救國激昂言論辭出不窮。然於此時，中央官員內受皇帝剛愎自用、猜忌個性困擾，外又有過於理想甚且流於偏激的言路輿論，使中央官員以致仕為重，不想待在政府任事。<sup>47</sup>

<sup>43</sup> 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第2齣，〈隱奸〉，頁19。

<sup>4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與戴悟軒〉，頁49a~49b。

<sup>45</sup> 關於密揭一案，若想知道當時謠言內容，可參見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收錄《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冊，卷9，〈王文肅密揭之發〉中所提內容，頁2147~2148。筆者於下文會有所著墨。

<sup>46</sup> 以上湯顯祖、毛文龍二事可參見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第2齣，〈隱奸〉中的相關記載。

<sup>47</sup> 以上可參見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中提及張居正與當時明代中後期政局的關係，以及居正死後，其對明代中後期政局的影響；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則提及晚明當時社會風氣充斥一股戾氣，士人

繼儒的懼正是對世局失望的體現。繼儒在諸多著作中，多有提及對社會、政治與言路的看法。如：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sup>48</sup>

說明士大夫心浮氣躁，專為黨爭相鬥的惡習。並以為「士大夫有門戶之爭，故國家有門庭之寇」，<sup>49</sup>表達對門戶相爭的厭惡。復以：

若門戶二字膠粘如故，鷓蚌兩持，漁人起而收其利，其在中狷乎？中行獨復，中立不倚，微獨人品攸繫，亦抑國事所關。<sup>50</sup>

呼籲在朝士夫不要太過專注門戶爭鬥中，以免為人於當中得利，並且以為人品的中行、中狷與國事相關。

門戶對明中後期政局社會影響，亦在講學上有門戶相爭情形：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十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sup>51</sup>

以為講道學本為匡濟天下好事，但不可在門戶上涇渭分明，使人望而生畏。舉嚴君平（嚴遵）言行舉止為例，說明講學不可徒有虛名，要重實不重名。又據：

竊聞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擔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於門戶、任於門戶、獨不和於門戶，雖堯舜奈之何哉！<sup>52</sup>

似乎皇帝對朝中黨爭問題也無可奈何，繼儒身處邦野亦發出感嘆，對於士人熱中門戶之爭深感無奈，且對從中引發的訛言傷人更表恐懼。

---

心態過於激昂且有人云亦云的情況出現，同時言路盛行與經世之論瀰漫於社會當中，但是士人卻都對從政不敢興趣。當中亦提及有關士風、遊道的一些檢討。至於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第三章至第七章，提及明中後期士人心態由徘徊世俗尋求新準則，到末世情懷徘徊救世與隱遁之間的矛盾。以上諸書皆有提及明代中後期士人心態的轉變，同時對當時政局社會演變亦有不錯言論。大致可知明中晚期政局不穩、社會上漸由士商混合、文人探索出新生活模式與社會風氣漸向文人化與雅俗交融邁進。

<sup>48</sup> 陳繼儒著，《安得長者言》，《寶顏堂秘笈》，第22冊，頁5b。

<sup>49</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馮楨卿〉，頁36a。

<sup>50</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馮楨卿〉，頁36b。

<sup>51</sup>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頁6a~7a。

<sup>5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潘昭度〉，頁39a。

繼儒在文集的尺牘部分中，凡提及時事社會狀況者，大多會提及社會上瀰漫一股纏言中傷風氣。言路輿論在長期政爭惡鬥下淪為門戶爭鬥工具，民間士子亦以謠言傳播、中傷為手段攻訐他人。如繼儒於〈復馮文所〉中提到：

近者，吳越之間，雌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知鄙語之菲謬也！<sup>53</sup>

說明近來吳越訛言增多，整個地方充斥中傷風氣，勸馮時可（馮文所）別回鄉以免落人口實。此種對於言路受謠言操弄的恐懼源於自身於萬曆 35 年(1607)，因密揭案為人中傷，險些招來殺身之禍有關。如繼儒於〈復于中甫〉中所言：

此揭發時，弟之大兒就婚，小兒就試，略不知一毫影響。悠悠之說既云：『撰之自不肖，洩之自澹生。』真可大笑！妖書波及於吾丈，賴海內忠賢不平；密揭波及於弟，賴吾丈忠賢力辯。不然，弟且不知死所矣。<sup>54</sup>

另在〈與戴悟軒〉中亦有提及：

聞京師謂太原二揭，弟為床頭人，此說極可笑！此公失而又失，若弟與聞必且救，正王澹生每向人云：『正謂不遇眉公，故納此敗闕』。若此揭自弟，攻者四起，此老方跳躁痛恨之不暇，而復聽辯揭乎？此故可以無辯，但恐以訛傳訛，非獨傷品，實且招禍。吾鄉賢者知，必笑而白之矣！前楊公薦疏，弟謂可懼不可喜，天道忌盈，人情責備，此大非佳事。自此疏一出，或忌或謗，信乎！好事不如無也。<sup>55</sup>

文中除自我辯解外，也強調受誣的無奈與自身受薦舉的畏懼。認為密揭一事乃眼紅嫉妒者嫉妒自身高名所誣。於文末發出身處此時好事不如無以免惹禍上身的感慨。另在〈與王季重〉中亦提及對於士大夫相互讒言相害表示畏懼：

今浙中差強人意，然以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也，屈申寧在眉睫間哉！<sup>56</sup>

因為對於謠言有極深恐懼感受，故產生強烈避世感嘆：

山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輩蒹草種葯，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sup>57</sup>

<sup>5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馮文所〉，頁 30b。

<sup>5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于中甫〉，頁 32a。

<sup>5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與戴悟軒〉，頁 49a~49b。

<sup>56</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與王季重〉，頁 22b。

<sup>57</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與王季重〉，頁 22b~23a。

對門戶爭鬥、社會謠言傷人畏懼的同時，繼儒雖也有避世逃名念頭，但對國家大事、社會風尚卻持著冷靜透徹看法，不像其他山人抱著自我享樂的心態：

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至四五十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月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為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楛，試少，卻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瘞，只合閉門面牆，不忍見此咄咄事！<sup>58</sup>

文中表達因木棉大出，使棉布價格大跌，農家不屑採收，使服制不定；士子則因試少好湊熱鬧，抬神像前往郡署前胡鬧，表現士風躁浮的一面。繼儒復有「邇來人情惡薄，反面操戈」之嘆，<sup>59</sup>對於當時人情淡薄，人際關係險惡表示感嘆。且對於時事亦有評論。如：

自來軍興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富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竄，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目不逞之輩所在而有。<sup>60</sup>

說明當時東南一帶所遇困境，並且以為這樣下去會導致政府經濟命脈受到大打擊，使國家遭到災難。與：

今海內多故，其兵之始餉之終乎？物價之貴而不復賤也，錢法之賤而不復貴也，人情士風之好動而不復止也，好尖刻而不復長厚也。<sup>61</sup>

說明當時世事每下愈沉，不但兵餉調度有問題，物價愈貴而幣值愈賤，且社會風俗趨於浮動焦躁與尖刻。呈現出繼儒對社會當時看法，以為風俗之所以如此差乃「世道詭隨」，而「詭隨者，第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耳」。<sup>62</sup>

繼儒在身處享樂風潮與門戶相爭激烈時代中，一方面因名高遭謗，感嘆時局士風澆薄，有懼名避世之感；另一方面卻十分注意時局變化，提出許多見解，對時局有一透徹分析，但最終似仍逃名之念。

綜上所述，陳繼儒畏懼心態主要體現在：對言路輿論瀾漫一股謗毀風氣感到畏懼；對朝中門戶相爭、不勇於任事、閹寺干政與士大夫顛倒黑白感到絕望；以及社會上充斥著詭隨風氣，人云亦云，穩健厚重之風以失，代之以浮躁、誇大風氣。又因舊價值觀已逝，新價值觀尚在摸索，社會價值多樣化，使許多前所未見的風氣出現，使人心浮動，人們對未來充斥一股焦慮感。

<sup>58</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9a~9b。

<sup>59</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申玄渚〉，頁 36a。

<sup>60</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畢白陽〉，頁 4a。

<sup>6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陳默菴〉，頁 16a。

<sup>62</sup> 以上兩條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陳默菴〉，頁 16a~16b。

繼儒身處當中，一方面以山人隱逸自居，隱士意念不曾忘歇，對政治亦有失望感受，多次有避世逃名之感；另一方面，因對政治、社會言路、士風有極深畏懼感，使其能冷靜、深刻的去觀察當時狀況。然而，繼儒雖有避世逃名之感，卻沒有如隱士般的棄絕人世，也不似當時山人般沈浸自身優雅文化小天地中，對世事漠不關心。相反地，繼儒反而以其畏懼心態，在塵世間伏匍前進，除了敏銳的冷靜觀察時局，也不是對政事、社會提出建議。此種因畏懼心態而清楚認識自身，並努力適應生活，正是陳繼儒人格一大特色。<sup>63</sup>

## （二）一段世情，全憑冷眼觀破：陳繼儒之慎

陳繼儒，一方面以清雅山林文化實踐能手聞名，獨領流行時尚多年，成為當時山人楷模；另一方面又以「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備顧問」<sup>64</sup>的形象為人仰慕，有山中宰相之譽。<sup>65</sup>後者名聲實奠基於繼儒屢拒徵辟基礎上，之所以屢拒徵辟則又與其戒懼心態相關。因對時局混亂心懷恐懼，明白須以圓通處事態度為主，才能免禍當時。而由懼生慎的謹慎冷靜態度，也使繼儒在時局觀察上比他人多了些清醒與冷靜。正因用戒懼心態看待時事，以對政治社會的憂患意識，引發謹慎處世態度，清楚明白身處環境與對山人角色於當中的扮演和能力。以下就陳繼儒對政治社會的評論作一討論。

### 1、謠言盛行：

繼儒對謠言傳播的畏懼，在上節已有諸多論述。關於謠言氾濫程度，另可見繼儒於著作中所表現的感嘆以得之。如：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媾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化其言而為訛也。<sup>66</sup>

<sup>63</sup> 關於繼儒的隱士討論與他人對繼儒的描寫，可參見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中州學刊》151，2006，頁224~227。文中對繼儒以隱士裝飾自身的享樂作討論，並且以為其乃浪得虛名之徒，其之所以受時人歡迎乃是其生活方式表達了當時大眾心中理想罷了；而李斌的〈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則採對繼儒隱士風範誇獎與肯定繼儒的論述；另外夏咸淳的〈論晚明隱士陳繼儒〉則以為繼儒的確有隱士風範存在，且與其他同時代士人相比，有一股憂世救國風範，既肯定繼儒憂世熱情，也不忘提及其清雅生活的享樂。不過，大抵上仍把繼儒個性分成兩面來討論，強調繼儒隱士風範者，會刻意忽略繼儒世俗的一面；而討論繼儒山人市儈一面者，又會忽視繼儒冷靜觀察時局與救世情懷的一面。筆者打算努力呈現繼儒這兩面性格以完整顯示繼儒。

<sup>64</sup> 陳夢蓮編，《眉公府君年譜》，收錄於《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53冊，頁479~480。

<sup>65</sup> 請見《眉公府君年譜》崇禎十年江西巡撫解學龍對繼儒的稱讚「本經術而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真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頁481~482，可知當時繼儒確有享山中宰相之美名。

<sup>66</sup>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頁7b。

說明吳地風俗好謠言景象，並且以為這是游閒小人入門之漸，是非口舌聚集之地，繼儒認為地方如果無新聞可說，就是好風俗好世界。復在〈復周懷魯撫台〉一文中提及：

不曷嘆息是非倒置一至於此！某不特致疑今日之白簡，且轉疑古人之青史矣！某自丙戌年即裂青襟，里居教授，生平未嘗渡揚子江。且有謂太原公當國，而不肖同在京邸者，尤為可笑也！<sup>67</sup>

說明自身被傳與王錫爵同在京師，嘆息社會上訛言四出，不但今日官員的奏章不可信，就連史籍亦不可信，以此表達對世道紛亂的看法。在〈答錢彥林〉一文中，復以「近來熒惑下降，赤舌燒人，朝野何止于此，雖一時未便請卹，久當自明。」<sup>68</sup>來說明當時政局混亂，謠言四起情形，雖然一時未能使東林黨人翻案請卹，但是時久必自明。

由上可知明代後期謠言氾濫程度，此種情況似可以吳地好問新聞為例。繼儒對此抱著批評角度，但以為還是抱著「蠖蟄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言外惟有感嘆！」的退縮態度來個冷眼旁觀。<sup>69</sup>然而，筆者以為此種退縮態度實有戒慎成分於其中，並以此安身。

## 2、對講學看法：

陳繼儒對當時講學氾濫、言論空疏不切實際，多有批評，尤其對於講學家以門戶之別相爭不下，表示唾棄，以為把精力虛耗當中，無益當時日益危險局勢。多次表明門戶之爭不可有，講學不如講實務之主張。其對講學看法有「吟詩劣于講書，罵座惡于足恭。兩而揆之，寧為薄幸狂夫，不作厚顏君子。」<sup>70</sup>以為講學家雖孜孜以君子自勵，但在繼儒眼中看來，反不如一個胸懷鬱積的狂夫。因為狂夫至少表現出自身真性情，而人有真情乃真豪傑是晚明社會流行看法，以此諷刺道學家雖以君子自居，卻厚顏博虛名，把講學末風表露無遺。在〈復馮文所〉中，以講學產生弊病作一詳細解說為例：

憨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sup>71</sup>

復在〈答錢龍門〉中，以「縉紳講學不如實實講賦役，當道清詞訟不如實實清賦

<sup>67</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周懷魯撫台〉，頁 27a。

<sup>68</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錢彥林〉，頁 42a。

<sup>69</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畢白陽〉，頁 4b。

<sup>70</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 3，〈峭〉，頁 47。

<sup>7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馮文所〉，頁 30a~30b。

役」的呼聲，<sup>72</sup>以為與其專注講學、清詞訟，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解決地方賦役問題，把賦役弊病解決掉，表現出務實治學觀點。

再者，繼儒對當時講學活動抱著不積極加入態度。如：

拓子游故祠，倡道學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某幼學雕蟲，長漸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林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sup>73</sup>

以自身山林野人身份不去參加常熟縣令耿橘在虞山書院主持的講會。文中雖肯定講學雅集論學性質，且多正人君子參列其中，但自身仍不輕易前往講會。

此一審慎態度也表現在拒絕顧憲成東林書院講學邀約，如「槩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sup>74</sup>之所以對入講會抱持此種謹慎態度，可能與當時環境有關，如：

前東林、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為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繫。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廁足其間以招攀緣之誚！<sup>75</sup>

即明白表示是因講學成員多縉紳，自己以布衣身份廁身其中，有干游諸大人之嫌，以及同列當中，若言語稍不慎，即可能惹禍上身的憂慮。另在〈復許繩齋郡侯〉中也以招講學不往是因「知者以為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為遊大人也」，<sup>76</sup>表現出畏與大人遊的謹慎態度。

### 3、社會風俗與士人習氣的憂患：

明萬曆後，社會風氣由奢華變好奇尚異風尚，加上此時清雅休閒的山林文化亦漸領江南流行風潮。使標榜山林文化傳承者的山人階層大興，造成大眾對山人有崇拜風潮，並以為名士風度在此。此風所及，使士人紛紛以好清言、矯言幽尚與干謁以博名高等行徑為主。如「奔走於權幸之門，自視不勝其榮，人竊以為辱；經營利名之場，操心不勝其苦，己反以為樂」，<sup>77</sup>繼儒以此提及奔走權幸門下以汲汲博名求利的干謁行徑。復以藉閑居好處說明當時交接頻仍、世態炎涼與言論囂染的社會現象：

閑居之趣，快活有五：不與交接，免拜送之禮，一也；終日觀書鼓琴，二也；睡起隨意，無有拘碍，三也；不聞炎涼囂染，四也；能課子耕讀，五

<sup>7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錢龍門〉，頁 44b。

<sup>7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3，〈答耿邑侯〉，頁 9a~9b。

<sup>7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9b。

<sup>7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與戴悟軒〉，頁 52a。

<sup>76</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9b。

<sup>77</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 5，〈素〉，頁 94。

也。<sup>78</sup>

另由繼儒對遊大人謹慎態度，參照與他人尺牘往來語句中，顯示對社會習尚與士風敗壞感嘆心情。如「俠之一字，昔以之加義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與氣骨之分」，<sup>79</sup>用以表示當時任俠風氣流於狂放形式，只注重表面任俠氣魄，無前人任俠重義內涵。又藉當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生是非，故知無事人好事」<sup>80</sup>的游閒歪風，說明當時游閒之人變多、好生事非、好詞訟生事的社會風氣。而此種游閒風氣，似與山人清客盛行有關。如：

邇來文章之公器，變為情面之私交，心竊駭之。<sup>81</sup>

與

邇來車騎連門，竿牘咽戶，便標作第一流人物。然易戒比匪，詩刺詭隨，二三多上，離上九亢悔，此不當號號恐懼，而乃沖沖而來乎？<sup>82</sup>

以干謁風氣盛行，文章成干謁工具，及文人相互藉詩文吹捧求名，表示感嘆與驚駭。繼儒認為此風使詩文變成個人交際與聲名獵取工具，讓詩文本為怡情養性的公器性質蒙羞。且以為干謁應抱著謹慎戒懼態度應對，怎可興致沖沖以詩文詭隨遞交？表現出繼儒個人對干謁看法。

繼儒在士風觀察上，記載亦非常多。大體皆以士風與世俗同化、士習充斥焦躁不安、社會附庸風雅者眾，以及好刺人隱私等感嘆為主。如：

自方袍幅巾之態遍滿天下，而超脫穎絕之士，遂以同流合污矯之，而世道不古矣。夫迂腐者既泥于法，而超脫者又越于法，然則士君子亦不偏不倚，期無所泥越而已矣。何必方袍幅巾，作此迂態耶？<sup>83</sup>

以社會上附庸風雅風氣太盛，士人欲分別士民，反以好古變古為手段。繼儒認為不需如此，僅需謹守法制不偏不倚即可。何必定以方袍幅巾為尚，效法迂腐古人樣貌。

且因干謁風氣大盛、文士氣息相通吹捧為尚，造成明後期名士風度流行成風，使士人趨之若鶩。關於明後期名士熱現象，在〈答張紹和〉中以為「名士使少年後進如蠅聚羶而蛾赴火，不赴丘園高蹈科，則走不求聞達科。愧死矣！愧死矣！」<sup>84</sup>表達名士熱引發士子希冀以山林逸士形象，或棄絕仕進形象，博得名士美名，以求聞達於社會的現象。繼儒對此感到羞愧致死，以為後進士子為一登名

<sup>78</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5，〈素〉，頁96。

<sup>79</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9。

<sup>80</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醒〉，頁9。

<sup>8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劉乾所〉，頁9a。

<sup>8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錢仲芳〉，頁19b。

<sup>83</sup>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1，〈法〉，頁178。

<sup>8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張紹和〉，頁2a。

士之列，把山林高士逸民形象拿來炒作，真是世風日下！另在〈答朱滄起〉「今朝野好學語、學步軍，竟是奴非主、是小兒非大人」中，<sup>85</sup>藉當時社會以《世說新語》、阮籍言行舉止為尚，以為名士風度在此。諷刺此為邯鄲學步，畫虎不成反類犬。

在士風弊病中，可以陳繼儒〈答錢龍門〉為楔子，說明當時士風的衰落。如：

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燥。』今民心凋弊，不敢燥、不能燥，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臺，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為桑梓計，為子孫計耳。<sup>86</sup>

說明東南地區的民困財窘，乃是縉紳士夫好廣田宅，不顧財賦差役弊病叢生，以自身為主，不為將來社稷作準備。

綜合上述種種社會風俗現象，可用〈答鄒愚谷〉中的一段話作總結：

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奪，則德性浮矣。目前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于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sup>87</sup>

當中提及士風之所以浮躁、空疏，實與胸懷騷雅意氣有關。在明中後期，由於士子對舉業熱情不再，紛紛以自身詩文才華干謁權幸，結文社、入講會交結同社會友，以相互吹捧博名高為尚。加以王學興起，使士人個性得以有所寄託，以心為主體，使士子自我意識變強。又王學以心性修養為主，強調一切行事準則以心中良知為判斷，不似朱子學以格致之道為主，強調依據外在經驗為判斷。雖然王學不排斥由外入內的修養身心，且在陽明講學時，亦以為讀書觀心性修養乃重要事之一。不過，到再傳弟子如江西王學、泰州學派等，即以心性論述為要點，不強調讀書靜心一套，遂有王學末流束書不觀弊病發生。又講學本為經世宣教之用，但至後期，隨著愈來愈多投機分子入講會以求名高之現象氾濫，使講學也成了李贄所謂「口談道德，志在穿窬」表裡不一態度。<sup>88</sup>

加以自萬曆中期以降，隨著爭國本與言路囂染情形愈加嚴重，大部分士子受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影響，而心有所焦慮、疑惑，故士風浮動。也才有繼儒所謂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情況發生。繼儒以為若要改變此種人心浮躁狀態，須從習靜觀書入手，以靜由內修養心性，使心定之後，再以多讀史書以知古鑒今，培養幹練政事手段，立志重回科考熱情，以仕宦救國的經世致用學問為主。由上可藉此

<sup>8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朱滄起〉，頁 30a。

<sup>86</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錢龍門〉，頁 44a。

<sup>87</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鄒愚谷〉，頁 44a。

<sup>88</sup> 李贄撰，張建業主編，劉幼生副主編，《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卷 2，〈又與焦弱候〉，頁 45。

瞭解繼儒在持謹慎心態看待士風浮躁過程中，其對士風看法與建議。

#### 4、時事觀察與政局瞭解之實用態度：

陳繼儒在明中後期以山人布衣身份獨領風騷多年，除了其山林清雅形象塑造外，其對政局透徹地瞭解與關懷時事發展的胸懷亦為原因之一。繼儒在文集中多次提到時局混亂、政局危險：

目前朝局一似劫基方熱，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靜燥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sup>89</sup>

繼儒認為目前政治環境像一盤危機重重的險棋，此時若想挽回大局，必須用冷眼旁觀清醒態度看清事實，以敦厚心地、沉穩態度與趨吉避凶的謹慎本事來濟世。充分表達出繼儒欲以沉穩、敦厚、謹慎濟世的想法。繼儒另在〈復楊弱水鹽臺〉中，以為「目前時局，爭殿之虎，戰野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sup>90</sup>藉時局混亂說明與其費心躲避災禍，不如使名字不留人間以求完全避禍，且以為若人無過份美譽自不會招忌惹禍了。既表達逃世觀念，又說明當時由於政局惡化，使人心趨於失望遁逃之現象。此種對政局絕望態度，實與當時環境有關：

今寓內外故，堯舜在上，猶有水旱夷狄盜賊之憂，此無他也。遇豐稔，則吏梳而官篋之；遇流劫，則寇梳而兵篋之。<sup>91</sup>

說明當時雖有勵精圖治的聖主，但由於王朝體制已壞，使百姓於豐年時，不僅被胥吏剝削，還被官員再壓榨一次；在荒年時，則除驚怕賊寇打劫外，復怕官兵洗劫。顯示明晚期吏治敗壞與士兵腐敗弊病。也因此，繼儒才會感嘆：

古今最怕者，夷狄、盜賊、水旱、災傷。今皆雜出於堯舜之世，可勝愁皇。去春伏枕半年，今秋閉門半月，不茶飴、不葯餌，幸而僥倖強起，然善忘善臥善嗔。<sup>92</sup>

繼儒以自身病軀剛癒為背景，說明此時內憂外患、水旱災四起，表現出當今世界充滿憂愁與驚惶之意，心中充斥憂愁茫然心態。

由於持著上述對政局不穩之憂愁態度，使繼儒對時事觀察有實用取向與謹慎態度。如「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

<sup>89</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10a。

<sup>90</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楊弱水鹽臺〉，頁 14a。

<sup>9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徐霞客〉，頁 21a~21b。

<sup>9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曹長卿〉，頁 18b。

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sup>93</sup>以爲不論將大行於世或藏身世外，皆須以謀懼心態應對，才可成功活在當下。可知繼儒看待時事是以冷靜旁觀論事態度加上切中時要的評論爲主。例如萬曆 36 年（1608）東南大水，繼儒上書王錫爵，在〈上王荆石相公〉中提及：

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即雨，隣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饑，漸釀疾病死亡之禍。<sup>94</sup>

藉水漫街市，人民爲水阻隔，衣食頓成問題，且饑濕交迫下，有疾病產生之危險的敘述，說明水患嚴重情形。文中亦敘及：

獨是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為僥倖數日之謀。而霖雨不休，泥土易敗，築於此潰於彼矣，成於尺敗於丈矣。況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苕霅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sup>95</sup>

上文藉敘述水患嚴重，使人民被水隔絕於世，且大雨不止，使修築堤岸防水一事受到延宕。一方面因連日雨不止，使土壁不牢易毀；另一方面又有太湖河水滔滔東下之虞，使地處低窪的蘇松地區，在積雨未濬情形下雪上加霜，人民苦不堪言。

繼儒認爲此次大水之所以如此嚴重，乃因：

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小民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四十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畱工本而濟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即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為朽株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於草莽矣。<sup>96</sup>

繼儒以爲水災嚴重原因是社會習俗的改變與節氣因素。一方面，繼儒認爲嘉靖 40 年（1561）以前，科捐少、風俗儉樸、人民從事本業者多，且水利修築完善，使災情不顯。但如今（萬曆年間）隨著朝廷花費日趨侈靡、社會吹起奢華風尚、人民財力日益虛耗，且隨著水利修築逐漸敗壞，使災情損傷逐漸慘重，使得百姓負擔加重，人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因水災發生於五六月間，正處穀物青黃交接時期，稻穀半生不熟。遇淫潦肆虐，遂使人民處穀物尚未熟透無法採收與節氣

<sup>9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與王季重〉，頁 22a~22b。

<sup>9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上王荆石相公〉，頁 1b。

<sup>9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上王荆石相公〉，頁 2a~2b。

<sup>96</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上王荆石相公〉，頁 1b~2a。

不合無法重新耕作的兩難境地。剩下可以倚恃的食物如花荳瓜菜，則又化爲朽株不可食用，起不到充饑效用。

繼儒眼見此一情形，認爲朝廷若不採斷然手段，以馬上賑濟災民爲急，則人民將因饑饉鋌而走險作亂：

京師財富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早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於桑麻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庠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sup>97</sup>

繼儒以東南乃朝廷財賦重地入手，說明蘇松經濟上的重要性。人民在常時由於能藉耕織並重應付朝廷稅收，但水患導致人民因忙於整田修堤，無暇負擔賦役，影響人民生計。繼儒於文中採漸進式敘述，說明人民在無暇藉紡織易薪米下，將坐以待斃，進而只求生存結夥搶劫，在官府律令下，因進退皆死，故可能不顧一切引發叛亂。藉著描述人民困境，警惕當權者注重此事，以賑濟災民、蠲免賦役爲第一優先。

另外，亦可從〈與聶井愚使君〉一文中，繼儒親身參與賑濟活動之記載瞭解繼儒對賑濟看法爲何：

巨浸無門，萬民如在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sup>98</sup>

繼儒認爲水患初退，百姓於此時四出求食，在處理善後事宜中需多加小心謹慎，以處理小兒痘症的謹慎態度去面對。又於文中敘述其主持粥場賑濟事項：

前承密諭，已默為料理久矣。第天馬山，華青搭界，比各鎮不同，故不得不精細以應嚴命。令粥冊以內不敢過減，稍汰其有田產、有生理者幾人而已；粥冊以內不敢過增，稍添其無戶籍、無控告者幾人而已。又恐人眾無統攝，必明白開寫於各畝之中。畝大有混擾，又明白分領於十甲之下。<sup>99</sup>

繼儒在所居天馬山中，首倡開粥場賑濟災民。由於天馬山地處華亭青浦交界，災民四出游食之際，名目混雜。繼儒處理方法爲繕寫粥冊，對照戶籍生計，把有能力生活者剔除賑濟名單，再將一些無戶籍遊民與無前科貧民加入粥冊中以賑濟

<sup>97</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上王荆石相公〉，頁 2b。

<sup>98</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聶井愚使君〉，頁 4a。

<sup>99</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聶井愚使君〉，頁 4b~5a。

之。在秩序維護上，採分區排隊，細分籍地以求方便統攝。

在上述東南大水中，繼儒對此看法與實行態度，顯以關心民瘼、熱心地方事務為主。在處理賑濟事項與上書當道時，亦以謹慎態度呼籲當道關心人民生計為主要手段。另外，繼儒在〈與韓鵬南使君〉一文中，以青浦大水一事，建議青浦縣令韓原善均派縣內賦役，使人民平均分攤，不使里甲一甲民眾負擔過重。同時修築堤岸減輕水患損害。<sup>100</sup>大體知曉繼儒對於賑災評論與建議事項，皆以冷靜審慎態度觀察之。同時以為賑災為最要緊事，先賑災以安民心，再以均派賦役或蠲免田賦為手段，與民修養。

繼儒除了對地方大事如東南大水表示關心外，對於流寇、滿州入侵問題亦有所關懷。例如在〈與朱敬韜〉一文中，提及孔有德攻登州一事：

春寒甚於冬威，戰守將士，逃竄難民，其苦更可念也。孔賊勾虜，山東是其熟路，登州是其出路，至天津之米、德州之布不暇，剽掠視如囊中物耳。

101

以崇禎4年（1631）孔有德奉登萊巡撫孫元化命，援助遼東大凌河之役。因天冷缺糧，復與守將不合，發動吳橋兵變，領兵攻打山東登州，後兵敗降清。另於文中提及當時滿蒙合勢對明朝影響：

目前東虜與西虜合，遼事可知；安氏與藺氏合，黔事可知。獨中州士大夫議論件件，意見相離。夫外合而內離，小醜合而君子離，天下事又可知！神旺者，欲談兵，何處下手？膽怯者，欲避兵，何處安身？<sup>102</sup>

由東虜與西虜合，指出滿州與蒙古結盟，帶給遼東防衛極大困擾，又指出當時西南貴州土司叛亂一事，因安氏與藺氏首領相合，使氣勢更甚，造成明朝於此地圍剿的困難。但是，在此險惡環境下，朝中士大夫卻依舊黨爭傾軋，議論相左。繼儒以為外患合而朝中士夫離，對天下大事毫無幫助，心中言語充斥無奈。

繼儒也對當時剿撫政策決議上有自身看法：

寇是撫局，奴是守局，此大段綱領。不能剿即不能撫，不掃寇則不能靖奴，此就中先後看。但寇之乞撫似真，奴之求款非實也，須看得分明講得透徹，痛快眉毛。兵口頭餉豈容易致其死命耶？今天下不必求文武全才，但求文武同心，如制撫、道總是也。<sup>103</sup>

繼儒傾向先安內後攘外，主張對流寇剿撫並用，以剿逼撫；對滿州則先以守局為

<sup>100</sup> 相關事件請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4，〈與韓鵬南使君〉，頁15a~16b。

<sup>10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與朱敬韜〉，頁25a~25b。

<sup>10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與朱敬韜〉，頁26b。

<sup>10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王念生〉，頁27a。

重，等待內部流寇剿滅後，再全力對付滿州入侵。文後亦提到如今之際不必硬求文武全才之士，只須文武將領同心即可。表達出對當時邊境文武官員不團結的感嘆。除此之外，繼儒亦在文中提到「撫之一字，誰信而誰任之，誰始而誰終之，惟千慎萬慎為主」，<sup>104</sup>表達招撫政策之實行，以誰值得信賴即任用誰，既任命之後，則再也不輕易更換。在選擇適用人才時，要千慎萬慎為主，小心為上。

關於繼儒在時事觀察與政局瞭解所表現的實用態度上，除了上述事件表達出關懷民瘼世事的經世胸懷外，在態度上亦以冷靜謹慎地提出建言為主。繼儒雖然關心國是，但卻不熱中投身政治當中，反而表現出若即若離的審慎態度。然而，此種謹畏態度並不妨礙繼儒於著作中提出大量策議，表達自身救世理想之態度。諸如繼儒收錄於《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60 的策議內容。當中內容多涉及田賦、稅役、士風與時事，如〈清花詭議〉中即提到田賦詭寄的弊病，認為若要清除此弊病，必須要任用誠實幹練者，清查土地，要求土地名目要清楚。而〈辨惠桂二王祿米議〉中則以松江府人民要負擔惠桂二王祿米為由，認為與其選用松江次白米，不如從上游運上白米以供二王使用，並且以為祿米由松江府出，一來米差、二來人民用錢換糧多此一舉，故建議直接從上白米處運至惠桂二王處，運費可由松府人民負擔，如此則既省力又便民。其他如〈縣總議〉說明縣令下設一縣總以方便處理縣內事務，但須選用得人且可輪值任用，以免擾民；〈布解議〉、〈布稅議〉則說明松江府負擔朝廷用布運送問題，提及運途遙遠與布料材質不佳，希望能折錢代替等等。

另外，繼儒於〈建州考〉中，詳述女真風俗，並且對女真起源有所考證，並於最後提及對付滿州方法與七大恨由來等。在上述當中，繼儒所表現之冷靜審慎態度，使其能以實用取向議論當中，正因其借懼心態，使陳繼儒得以用旁觀者清的態度去分析明代此時種種現象。

### 三、李贄、袁宏道、陳繼儒：狂者向狷者之調和

王陽明於正德年間在貴州龍場驛倡良知學，其內容雖駁雜且摻入釋道思想，但仍以儒家立德立功濟世思想為主要核心。當中以成聖、濟世為王學最初訴求。陽明之所以倡良知學就是見當時世風日下，人情日偷，想通過克己之道德修持與知行合一，以極大熱情的狂者胸次成大事、救社稷。<sup>105</sup>如陽明於年譜中所云：

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sup>106</sup>

強調自身體悟到狂者積極進取精神，以不顧世俗批評、直心而行，不作媚俗鄉愿，表現極大自信與熱情，以心中良知為形式準則，以狂者進取態度為主。

<sup>10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王念生〉，頁 27b。

<sup>105</sup> 關於王學形成與其最初訴求，可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二章，〈王陽明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頁 126~271。

<sup>106</sup>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 35，〈年譜三〉，頁 1287。

本節打算透過李贄、袁宏道、陳繼儒三人心態與處事態度，說明自正德王學初興，歷經嘉靖、萬曆朝演變，在上述三人身上體現出一種趨勢，即由狂者積極進取精神漸向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精神轉變。因此三人接回要於萬曆時期，加以名氣皆極大，在社會上億課有其影響力，可藉此表述某部分士人的精神趨向。以李贄的狂傲、袁宏道的自適與陳繼儒的調和，描述由狂者熱情進取到狷者選擇性退縮精神的世人精神面貌轉變，藉以討論明中後期政局社會對士人思想的影響與陳繼儒久享大名之因。

### (一) 天幸生我大膽與絕假純真：李贄的狂與真

自陽明以狂者自居，力倡良知學後，歷經王艮、顏鈞、何心隱等泰州學派的闡發與拓展，使王學中狂者形象益加張揚。至李贄則以其率性而為、絕假純真的言行態度，與積極進取、莫大自信及熱情的狂放心態，被時人目為異端教主，風靡一時。李贄，字卓吾，泉州人，生於嘉靖 6 年（1527），卒於萬曆 30 年（1602），為明中後期士人個性解放、崇尚真情的先驅者。亦為泰州學派發揚光大的主要人物。學者對李贄複雜人格、生平事蹟與思想的討論十分豐富。<sup>107</sup>在此，筆者僅以李贄的狂與真二部分來看其與中晚明政治社會的互動，以凸顯其狂者形象。

從孔子《論語·子路》中所云：「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sup>108</sup>以為若無中行者時，以狂狷者為友猶可成君子，透露出狂狷者於孔子心中地位。至明人蔡清則於《四書蒙引》中，藉劃分中行、狂、狷三等，說明其看法：

大抵天下好人有三樣：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之謂狂；又一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之謂狷；又一等，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節而所行又不至于過激，此則所謂中行者也。中行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sup>109</sup>

蔡清以狂者代表志向高遠、充滿熱情與大無畏精神；狷者表才力稍遜，開創不成而守成有餘，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性態度處世，潔身自守。中行者為既有狂者才識與熱情，復具狷者審慎清醒態度；有狂狷者之優點，無狂狷者之缺點。蔡清以中行者為上等人格，狂者次之，狷者又次之，代表明人對中行者與狂狷者的

<sup>107</sup> 參見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第五章，〈心學另類之人生悲劇〉，頁 265~343；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四章 第二節，〈李贄——陽明心學轉折的標誌〉，頁 545~601，以及史小軍《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等書中所述。其對李贄思想傳承自泰州學派、好名心態與自由不受羈絆的心態多有著墨。另外，對李贄之死一事在思想史上有何意義亦多有解釋。

<sup>108</sup> 孔子，趙龍文講述、錢仲鳴筆記，《論語今釋》中集（台北：正中書局，1985），〈子路 第十三〉，頁 1262。

<sup>109</sup> （明）蔡清撰，（明）莊煦編，《四書蒙引》，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1983）206 冊，卷 7，〈不得中行而與之章〉，頁 316~317。

看法。狂者比狷者好，乃因狂者具有志高遠與行不掩的積極精神，代表君子救世出位之思與任俠尚氣的狂傲風度使人聯想晉人狂簡風範。又王學與泰州學派中皆以狂者自居，主張救世不二人選為狂者。蔡清在敘述狂狷者時，其劃分依據在才識高下，以為狷者智不及而守有餘，對於狂狷者的劃分較注重在狂者氣習，把狷者視為狂者稍遜。李贄在〈與耿司寇告別〉中，亦有對狂狷者定義的闡釋：

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己均同于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故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sup>110</sup>

李贄認為所謂狂者乃是不依世俗既定規則行事，才力見識極高的智者。但因才高而自視過高，狂傲視物，以為自己與凡人不同，則落輕狂疏放之弊，學問人品易不切實際。而李贄認為的狷者之流，則是嚴守道德本分，不因利害義，其品德節操就如伯夷叔齊一般高潔。然若過於注重自身道德修持，去人欲太過，將變成對事物過於苛刻、不知變通，犯了個性過褊急之弊病。李贄認為狂者之疏放以致不實與狷者之太苛以致不虛都不切合中行，以為中行乃結合狂狷二者所成的中庸人格，是最好的。此處，李贄所論的狂狷者不以智力高低定優劣，以為狂狷者乃不同處世態度所形成的人格，認為中行者乃狂狷者的綜合體，乃中庸之道的代表。李贄對狂狷者之間的優劣四無明白劃分，但仍以中行者為理想人格。

細觀李贄行事，可知其處世態度偏向不依舊套的狂者風格，如他在〈讀書樂·引〉以自身論人不從舊觀，體現其張揚性格：

天幸生我大膽，凡世人之所忻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以為可托國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sup>111</sup>

上文中，李贄自我張揚個性、口無遮掩性格躍然紙上，當中且隱含自明中期以後，社會流行的標新立異風氣意味。此亦可由李贄於七十歲時所做〈豫約〉窺知一二：

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鈔錄之書於供桌之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干便收訖。<sup>112</sup>

<sup>110</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1，〈與耿司寇告別〉，頁25。

<sup>111</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6，〈讀書樂·引〉，頁213。

<sup>112</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豫約—早晚守塔〉，頁169。

上文明白表示李贄自坦好書、好香、好錢等嗜好，將身後事如此瑣碎呈現紙上，除顯示其率真個性，亦可見其標新立異心態。另又強調其嗜書如命，要門徒以己書為供，按時祭祀；要門徒牢收己書不輕外借、時時愛護之，表現對己身著作的執著，此亦為對立言事功的重視，為好名的表現。此與當時文集氾濫，世人皆以刻書留名為潮相符合。

李贄狂者特性乃是「兄（鄧石陽）精切于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敢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以佚」，<sup>113</sup>以逍遙率性為主。李贄另在〈自贊〉中表達摻入狂痴妄為的面貌：

其性褻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繩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孔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sup>114</sup>

李贄一方面自述個性褻急、傲色視人、言詞粗鄙、思想狂放且有痴癖，加上行為不受傳統拘束。其對待友朋則少交遊多真誠相待。旨在表現自身為一率性而為又不蹈傳統之狂人。因其狂，故個性衝動有話直說；又因其狂，具高度自信且以天下為己任，故有恃才傲物之習性，堅信自身理想而痴迷當中不自覺。表達其狂痴個性頑固、自重的一面。把狂者特立獨行、不同流俗特色顯露出來。另一方面，則又藉述說自身志求溫飽卻自視為夷齊高士之流；本性乃屬齊人乞食他人，驕己妻妾，言行不一，又自認己乃飽道飫德的賢者；分明一介不與，卻如有莘氏般找藉口攻打夏領地；又分明一毛不拔，卻又說楊朱學說賊害夫子仁道。李贄用此反面諷刺說法，反襯自身狷介性格與譏諷滿嘴仁義道德、存理去欲卻言行不一的假道學。

上述可見李贄另一特點，即求真。李贄在〈童心說〉中，即以不作偽為主旨：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sup>115</sup>

李贄認為如果失去童心，失去對事物抱持真誠熱情與探求的赤子之心，則人將有所蒙蔽，變的虛偽，會迷失自身，無法以心為良知追求知行合一的道德自持。若無真心，人亦無法顯露真切情感，亦將虛偽待人了。故復於〈讀若無母寄書〉中以為：

<sup>113</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1，〈又答石陽太守〉，頁5。

<sup>114</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3，〈自贊〉，頁121。

<sup>115</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3，〈童心說〉，頁92。

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sup>116</sup>

文中以若無母寄信給若無，敦促早回，表母思子之情。李贄以為此種真情流露，以真心訴諸文字當中，必然使人感同身受，發人肺腑。下以李贄〈復焦弱侯〉一文看其對「真」的追求與嚮往：

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捨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采仁義道德之事以自蓋。此其人心身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丑，故可稱。<sup>117</sup>

李贄把天下人分成三等，即處仕隱矛盾者、以隱博仕者，以及仕隱相融者三類。當中李贄以自身為仕隱矛盾者，既想仕宦經世，又不耐官場黑暗，欣羨隱居自適生活，徘徊仕隱矛盾中。李贄最看不起者，乃是以隱博仕者，認為此種人「名為山人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sup>118</sup>心裡虛偽不堪，不足與論。其心中最佩服者，乃是心境上已完全調和，以「適世」為主，在仕隱之間率性而為，誠實面對心中感受，不再有所疑惑與矛盾，屬仕隱相融者。可見李贄的「真」主要在「做自己」，以心中直率想法達到言行合一，不再有所虛假與困惑。

故李贄十分痛恨言行不一、言敏於行的假道學，此種對真誠的信念促使李贄狂者面貌益趨明顯。因心中對真的追求與知行合一的實踐，使其擁有高度自信，狂者胸次與真心更使其成為狂痴文人代表。此種狂、真結合的特色，使他在假道學看法上，給予相當尖銳批判：

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大聖人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摻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sup>119</sup>

在李贄筆下，講學者專務講學，不理時事的弊病與言敏於行的情形被生動描繪出來。言行不一的假道學只是以講學為博名逐利手段，是講學為利祿晉身之梯。正如李贄於〈又與焦弱侯〉中提及：

<sup>116</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讀若無母寄書〉，頁132。

<sup>117</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復焦弱侯〉，頁42。

<sup>118</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又與焦弱侯〉，頁45。

<sup>119</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因記往事〉，頁146。

今之所謂聖人者，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與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却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却聖人而以山人稱。輾轉反復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sup>120</sup>

上文，李贄把時人所稱聖人與山人皆視為欺世盜名之徒，以為兩者差異只在手段不同，言語中顯露出對當時人情虛偽的厭惡。以「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一針見血指出當時山人干謁與講學者講學蔚為風潮，引起博名求利輩的沿襲，造成山人、講學家龍蛇混雜弊端。

只是李贄個性褊急執拗，雖見解精闢，只是常流於疏狂，有以偏蓋全之嫌。如袁中道論李贄《藏書》所云：

…于是上下數千年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多在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往之過，不無偏有輕重。而捨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sup>121</sup>

袁中道以別出心眼視之，可知曉李贄以其狂真性格恣意評論，且從實用角度視之。如認為秦始皇乃千古一帝、五代安樂公馮道乃安民定邦的高人，稱之為吏隱，認為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數百人命成數十人名，十分不值。可見其論人獨樹一格之處。其以實用濟世角度任意評論他人，雖有偏頗，但能可見其有極深濟世念頭，對於世道淪喪抱持極大振衰之念。

綜上對李贄性格描述，顯示其狂放不拘、才氣縱橫與率性而為的一面。而李贄最喜愛的人物——嵇康亦為狂放自恣、從容禮法之外且充滿真性情者。李贄一生雖倡言百姓日用即是道，以邇言為真理所在，並且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十足異端形象。但是，其實李贄與嵇康皆為藉從容世俗禮法之外的曠達態度去隱藏其積極反思孔子真意的儒者。諷刺的是，兩人最後皆以名教罪人為政府所論死。這或許乃狂者的積極進取精神，使之有濟世之念，認為振世起衰捨我其誰，有吾一人往矣的豪俠氣概，所以會有「剛腸疾惡，輕事肆言，遇事輒發」的氣魄，<sup>122</sup>心中秉持絕假純真、嚮往原始單純不受拘束的生活，以從容禮法之外、率性而為之形式外露。李贄那狂與真相合的狂者性格，一方面使其欲以豪俠任事自詡，以真情濟世；另一方面又厭惡宦海虛偽，人心狡詐，欲隱遁山林率性生活。故此種厭偽性格亦使其對假道學有極大批評，把狂者積極狂揚特點發揮淋漓盡致。因

<sup>120</sup>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又與焦弱候〉，頁45。

<sup>121</sup> 袁中道，《珂雪齋前集》第四冊（台北：偉文，1976），卷16，〈李溫陵傳〉，頁1621。

<sup>122</sup> 嵇康撰，崔富章註譯，莊耀郎校閱，《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卷2，〈與山巨源絕交書〉，頁137。

此筆者以李贄為晚明士人尚俠、任事濟世的狂揚心態代表，為積極入世狂者性格代表。

## （二）袁宏道的自適人生：狂者與狷者過渡

在述說袁宏道自適態度前，先提萬曆 30 年（1602）李贄以名教罪人被逮至獄中，自縊身亡之事對當時士人有多大影響。由於李贄以狂放進取態度行事人間，直心而行，提倡日用即道、不以孔子是非為標準，以狂放行徑為士人所羨。但由於過於張狂為當權者所不容，以致死於獄中，使崇尚狂者進取濟世精神的士子受到打擊。加上萬曆後期，隨著張居正過世，新政漸散，申時行柔媚侍主與神宗長期與文官集團相對抗下，稅監礦使橫行、爭國本問題使朝中士夫紛爭不斷，朝政惡化。

面臨此種政事，士人除失望外，亦逐步喪失狂者從政濟世熱情，轉向自身逸樂或生活建構為主。故有袁宏道自適態度與癖好逸樂出現。可謂李贄之死，使士人面對狂者張揚性格的反思與思索自身如何在政事不可為與濟世不敢為的矛盾下做一抉擇，重新尋求自身價值觀。也因此才有自適論點出現，以求自身安適來舒緩內心的焦慮與苦悶。

隨著愈來愈多士人把對政治的進取精神轉向自身生活經營，除了造成山人清雅文化流行之外，也造成青樓名妓等情慾風蔚為風尚。更為重要者，由於士子專注於自身，使狂者內涵發生變化，由原本積極進取的外向濟世熱情變成狂放恣意的自我享樂。袁宏道正是狂者內涵逐漸轉化的一個好例子。一方面，他三度出入仕隱之間，除有其經濟因素，亦可見其仍有濟世理想；另一方面，又以「癖」作為真性情、真人之寄託，以為「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sup>123</sup>象徵狂者依心而行的胸次漸向自身癖好轉化，同時亦有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退縮意涵在當中。可見袁宏道「自適」、「癖」的提出有其時代背景與特色。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生於隆慶 2 年（1568），卒於萬曆 38 年（1610），明代公安派領導人之一，提倡自適與癖之生活。其三度出入仕隱之間即被認為是自適態度的體現。<sup>124</sup>筆者以為此事亦可視為宏道由狂者至狷者過渡的要項，象徵士人對仕隱取捨與漸對政治失望的表徵。宏道與李贄相同，皆認為適世乃人生最高理想，如在〈徐漢明〉一文中所示：

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數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

<sup>123</sup> 張岱撰，于學周、田剛點校，《陶庵夢憶》（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卷 4，〈祁止祥癖〉，頁 111。

<sup>124</sup> 如史小軍於《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頁 212~225 中，即認為袁宏道三度出入仕隱乃其自適生活的體現，表現出袁宏道不受拘束的曠達心態。

出世者，達摩、馬祖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為禪也，戒行不足；以為儒也，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sup>125</sup>

宏道以為適世之人隨心所欲過生活，悠遊於禪、儒與諸般雜藝之間，任何事物均有涉獵，但於世間卻不堪一務，無法托以重任，乃是天下最不緊要的閒人。於世間無所忤違的過日子，既無狂者濟世抱負，也無豪俠任誕激情，只是滿足於自我欲望、閒適自娛，沒有任何大起大落地過完一生。宏道的理想就是這種活於自身世界、不管外務的生活。由此亦可見宏道的適世理想與李贄的不同處。

雖說李、袁二人既為忘年好友，又同追求「適世」理想，但二人對人生態度有所不同。若說李贄為濟世狂者，則袁宏道即為較偏向自身的任誕者。且李贄的狂乃基於自身高度自信與積極進取的濟世精神，顯現其行不掩言的狂者胸次；與宏道偏於追求個人真心，以自適為主，經營自身小天地逸樂的退縮狂者，是以個人高度自尊為主的人生追求有本質上的不同。此從其仕隱抉擇與對癖的闡發可窺知一二。

袁宏道在萬曆 23 年（1595）任吳縣縣令時，雖贏得「二百年來無此令矣」的美譽，<sup>126</sup>但宏道卻多次訴說吳縣任內之苦，如〈沈博士〉一文中，即以奔走辛勞之苦敘之：

作吳令，無復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sup>127</sup>

宏道認為光處理縣內雜事與迎送上官即十分擾人，何況復有干謁人等與人情世故等事物，使自身堂堂七尺身軀變為柔弱如柳枝的軟骨頭。在〈王以明〉一文則吐露無友朋可談心解悶之苦：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毫孔

<sup>125</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5，《錦帆集》之三 尺牘，〈徐漢明〉，頁 217~218。

<sup>126</sup> 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卷 17，〈吏部驗封司郎中郎行狀〉，頁 1707。

<sup>127</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5，《錦帆集》之三 尺牘，〈沈博士〉，頁 219~220。

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sup>128</sup>

向友朋訴說雖作吳令公事繁忙，但仍可忍受，只是無知心好友與自身暢談玄理，心靈無法脫離俗世，享受短暫脫俗之想。宏道於〈蘭澤·雲澤叔〉中，大吐身處繁華天堂卻無法享樂當中之苦：

金閨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蕭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陽，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sup>129</sup>

文中從吳地乃士人夢想的花花世界、溫柔鄉與文化高潔景色優美之地，襯托吳地的好，而話鋒一轉，認為這種種令士子欣羨的好處與吳令毫無關係。由於公務過忙，無法撥冗細覽吳地這一片花花世界，使宏道認為吳令之位沒有想像中美好，無法同蘇軾、白樂天相同，在任內享受美好湖光與知心好友暢談玄理的風雅。在〈沈廣乘〉中，一次爆發地訴說吳令工作極苦處：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sup>130</sup>

文中以作吳令種種苦處與自身受謠言中傷為理由，對吳縣地方感到畏懼與不耐。文中所提吳令應對嘴臉可用〈丘長孺〉一文，宏道對官場迎送、交際之苦，做一總結視之：

作令備極丑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sup>131</sup>

文中把面對上官時，卑躬屈膝、盡心奉侍的奴僕樣；與面對往來公差，笑臉迎人，如侍奉貴客的妓女面貌；以及管理賦役時，一副錙銖必較、苛刻算計的低層雜吏一般；又必須如同媒婆般苦口婆心、舌燦蓮花地教諭百姓，把官場中虛偽、勞累

<sup>128</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王以明〉，頁223。

<sup>129</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蘭澤·雲澤叔〉，頁211。

<sup>130</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沈廣乘〉，頁242。

<sup>131</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丘長孺〉，頁208。

面目生動呈現。並於文後透露出自身不喜此種裝顏察色之事。

雖然袁宏道於上文敘述中，對作吳令一事大吐苦水，然宏道在吳令任內卻備受百姓愛戴，為官精練公正，把吳縣治理井井有條，可見其才幹。而其亦並非真想隱於山中做出世之想，此從三度出入仕隱間可佐證之。正如宏道本人於〈答王則之檢討〉所云：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sup>132</sup>

宏道認為仕與隱各有苦處，當官有樂也有苦；山居家中亦有樂苦。宏道以為仕隱優劣各有千秋，不能抉擇。總的來說，即做官熱鬧不能享受片刻清閑；山居卻是想熱鬧也無法如願，清閑過頭反而孤寂。在〈蘭澤·雲澤兩叔〉中，宏道對自身仕隱抉擇反覆作一自嘲敘述：

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即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sup>133</sup>

宏道在仕隱徘徊情形中，逐漸發展出自身處事態度的思索與調整，漸知曉自身喜熱鬧亦愛閑靜的矛盾性格，認為自己出入官場，雖心中以自適為主，但面臨濟世與出世的焦慮與矛盾仍覺無奈與痛苦。不過，宏道在〈人日自笑〉一詩中，倒是明白表示自己以「自適」為理想：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著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鬢鬚，是仙擁眉黛。倏而哭寂林，倏而喧囂闌。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籟。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頽焉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sup>134</sup>

上文可見宏道追求自適生活的一面。其理想生活就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拘束，嚮往似官非官、似農非農、似隱非隱似儒非儒、似仙非仙的形象，動靜、貴賤與歌酒、屈伸之間的出處皆掌握在自身，此乃宏道在仕隱間，為排除自身矛盾痛苦所得出的自適論說。

<sup>132</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21，《瓶花齋集》之九 尺牘，〈答王則之檢討〉，頁 741。

<sup>133</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5，《錦帆集》之三 尺牘，〈蘭澤、雲澤兩叔〉，頁 211。

<sup>134</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33，《瀟碧堂集》之九 詩，〈人日自笑〉，頁 1058。

自適核心在追求自我，尋求自身精神獨立。若將自適觀點與宏道提倡的有真癖才有真性情相搭配，則可以宏道在〈龔惟長先生〉中提及的五快活為例：

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烏，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蘊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sup>135</sup>

文中於前先提及人生苦短，士人爲功名利祿所惑，身在苦中不知其苦，提出真樂有五的五快活說。五快活中，除了第三快活表現出文人雅趣與偏向精神追求，其餘皆表露出對物欲的欣羨感，追求自身生活安逸快活爲主。當中也摻雜了雅俗交流訊息於其中，藉浮舟遊玩、歌劇鼓吹與列鼎度曲於堂等較屬文人趣味形象掩飾其對物欲露骨追求。值得注意者，宏道把敗盡家產，托鉢妓院行乞爲生也視作真樂之一，除表現其狂放態度與自適心態的調適外，更有一股任俠氣魄。只是宏道把原本積極進取依心而行的狂者胸次，變成專注物質享樂上，任誕狂放的疏狂心態，與李贄狂者風度有根本上差異。

此種自我享樂的流露，除了代表面臨政治惡化，使部分士人轉而以佈置自身小天地爲寄託，同時亦表現出自身真性情所在。如宏道在《瓶史》中以爲人有癖才顯得有特色、有真心，具有磊傀僂逸風度：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傀僂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

136

宏道藉歷來文士之癖，說明文士的各種癖好爲寄託其超拔高潔人品所現。在自身狂磊僂逸之氣不能抒發於外時，寄情某癖成了宣洩內心焦慮苦悶出口。宏道認爲一個有真性情、胸懷大志者必有所鍾情於某事物，即便犧牲生命亦不惜前往達成。

依上述觀點，我們可認爲宏道把李贄入世情懷的狂者胸次也視爲一種「癖」。李贄自身明白《藏書》、《焚書》的出版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但基於好名與濟世心

<sup>135</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3尺牘，〈龔惟長先生〉，頁205~206。

<sup>136</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24，《瓶史》，〈十好事〉，頁826。

態，仍將書出版，這或可視為一種「入世癖」或「好名癖」。只是此種「癖」偏向精神層面，與宏道的山水癖、青娥癖、酒癖、茶癖、花癖等重在物質面的癖好不同。不過，雙方皆以真性情去對待之，寄託自身於當中。此種「癖」的闡發，除了顯現士人對真性情的追求，亦代表部分士人由經世救國的狂者理想，漸往自身小天地發展，希冀藉寄託於各種癖之中，當成麻醉自身對政局危亂的苦悶與宣洩內心仕隱矛盾心情的良藥。

宏道在生活處世上，一直以自適為主，以率真表現自我，使人們習把宏道視為晚明閑適文人代表。以其小品清新脫俗，對世事描述不多，沈湎於自身烏托邦中。但他在〈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其二〉中以：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  
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  
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少年淚！<sup>137</sup>

詩意中所表現的，乃是眼賞春花美色卻以淚入酒，心中哀慟激發落淚；成束邸報皆投爐成了一筐筐灰燼；朝中大臣寧典官服以栽花養生，而不理朝事；自身雖作千餘言風流可喜呈現悠然自在態度的新詞小詩，以清新飄逸示人，但他人如此認為時，自身卻是有苦難言，只好藉縱情山水之中。最後，在嚴密政治壓力與輿論橫行下，言語既無法真情流露，只好效法阮籍「口不擇人過」的謹戒心態，以醉待世了。一字一句道盡心中無奈與悲痛，同時也見到以自適為目標的宏道，依然沒有完美調和心中仕隱、出入世的矛盾與引發的對自身定義的焦慮。

另外，宏道在〈猛虎行〉中，以強烈措辭直揭礦稅苛政，表達濃厚關懷民瘼之意：

甲蟲蠹太平，搜利及丘空。  
板卒附中官，鑽簇如蜂踴。  
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  
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  
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  
即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蓰。  
礦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  
一不酬所欲，忿決如狼豕。

<sup>137</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16，《瓶花齋集》之四 詩，〈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其二〉，頁651。

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  
焉知疥癬憂，不延為瘡痍。<sup>138</sup>

詩中描述萬曆時期礦禍嚴重，地方惡霸依附宦官斂財，為禍地方，撫按大官不敢過問，州縣長官完全管不著。宏道並敘述從三河到兩浙等東南地區皆受其害。詩意充分表達出憂國憂民意涵，直揭「甲蟲蠹太平」透露出國家處境如此，官員尚且粉飾太平，陰柔持政，表達其內心焦慮與關懷世道之心。

由上述可知宏道雖以自適生活為理想，在仕隱之間達到率性而為，且不諱言自己有諸多癖好與當官實為金錢不足以供給花費的誠實態度。其在生活美感經營上，有《瓶史》、《觴政》與諸多詩文敘述其藝術化生活情景。乍看之下，宏道似乎為一悠遊林下的文人，但宏道仍保有部分狂者進取精神。在關懷時事與批評朝政的強度絲毫不輸李贄，只因見達觀、李贄相繼因涉入政治事件而死，對朝政不明感到仕途前途茫然，開始在仕隱之間徘徊。

在摸索過程中，提出「癖」、「自適」等理論，企圖找出在狂者「君子出位之思」的進取精神不被朝廷欣賞甚且引來殺身之禍下，如何替自身行藏出入定位。面臨政治日益黑暗，狂者兼濟天下理想日難發揮的情形下，代之而起的，乃是轉向自身生活經營，希冀藉此寄託其苦悶感，使其有地方宣洩。在面臨自身仕隱之間的焦慮下，開始有放浪形骸如張鳳翼、張獻翼、王穉登等偏向世俗物質生活者；亦有如袁宏道、陳繼儒之流，由狂者義無反顧的積極濟世理想到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性退縮精神者。

袁宏道乃是由狂入狷的依個過渡型代表人物，其雖然以自適出入仕隱之間，但內心卻因自身濟世理想礙於政局無法盡力發揮，持著焦慮定位自身與兼濟天下理想無法達成的苦悶，依舊無法達到內心真正的和諧。此種對於仕隱與濟世避世的焦慮與苦悶實為同時代士人所擁有，故宏道的自適論與真癖說以及公安派之所以能風行明中後期，實與宏道由狂入狷探索文人自身定位有關。

### （三）陳繼儒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

相較於處在行藏矛盾下並對此有所焦慮的士人而言，陳繼儒一開始就把自身明白摒除在仕途之外。繼儒在 29 歲科考失利後，即放棄生員資格隱居小崑山中，以「隱」標示自身，對崇禎朝徵辟多次拒絕。因一直為布衣身份，無李贄、袁宏道那種有出入仕隱之間問題，心中不會有處仕途上卻見政局敗壞無力回天的無力感，與既萌退隱山林之念後，復因強列出位之思而又再度入仕的尷尬與無奈感，心中較為平靜、舒緩，能用心平氣和態度審視政事。亦因心中較之李袁二人相對平靜，故能於童心說、自適說與性靈理論的實踐上，比二人更能接近依心而行、自適閒散的生命觀。另以自適為主，把山林文化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以自身山

<sup>138</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13，《瓶花齋集》之一 詩，〈猛虎行〉，頁 581。

林生活為表演舞台，完美闡發山林優雅文化精髓，表達山人文化中藝術化生活的絕妙搭配。

然而，繼儒的山居生活與傳統出世隱士生活並不相同，其謀生方式亦非躬耕弋釣，而是以作家身分著書自娛，出版有關各類書籍，藉以謀生。並以文名建立自身於社會、士人間的地位，「聲名遠播，古之通隱，庶幾近之」，<sup>139</sup>成為明中晚期首屈一指的風雅大師。因有獨立經濟來源，可不為五斗米折腰，故心態上比宏道因老父期盼與經濟壓力多次出入仕隱；與李贄為養家活口而勉力為官來的平和與自重。此種心態亦影響到其看待世事態度。相較於李袁對時事激昂慷慨態度而言，繼儒採取審慎態度視之。

繼儒少對國家大事提出尖刻批判，其看法偏向冷靜分析並委婉表達生民之苦與朝政之亂的感慨；並於事情處理上不似李贄、達觀般狂放激揚，以大無畏精神行事。繼儒乃先慮自身安危，思索如何在不危害自身下，達到改善朝政目標，是一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

關於狷者精神，用顏元於《顏習齋言行錄》中所云，即為：

「狷者有所不為」，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關。凡欲非道非義，固斷斷不染，即遇人物亦若有不輕交、不願交、不敢交意。即遇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為」。每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每當取時，卻是得舍便舍，是狷者真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sup>140</sup>

文中以為「狷者有所不為」指的是凡事考慮周詳，不輕易行動，遇時事不佳時，則把持心念不同流合污，乃是嚴謹戒慎的處事態度。狷者面貌並非只是守有餘而力不足，在進取時能冷靜審視時事而急流勇退；在取捨時能看清時勢當機立斷，該捨就捨，把狷者冷靜審視、謹慎周詳特色描述一清二楚。在待人處事上，則以不輕、不願、不敢三不為特色，除了表達其內心戒懼謹慎外，反映於處事上則以圓通為特色。

繼儒與徐階、王世貞、陸樹聲、王錫爵等交善，也與顧憲成、鄒迪光、顧養謙等有來往。其交遊之廣可從文集序文、壽序與尺牘窺知一二，幾乎所有知名文人名妓皆與繼儒有交遊。此故因其文名遠播，使他人欲藉繼儒之名以博晉升名士之階；也與繼儒交遊態度以淡（不輕交）有關。

繼儒圓通淡交的處事方式，實與當時言論毀謗成風、政治黑暗有關。明晚期社會上謠言成風，士子以謠言相害，致使繼儒對交遊採慎重心態，效法嵇康「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林下高士風，以阮籍「口不論人過」為待人之道，少有激烈批評他人之處。有趣的是，李贄、繼儒均以嵇康為理想人格，但雙方著重點確

<sup>139</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 637。

<sup>140</sup> 顏元撰，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顏習齋言行錄》，卷下，〈鼓琴 第十一〉，頁 661。

有極大不同。李贄喜愛嵇康純真狂放的一面；繼儒則注重嵇康所展現的林下名士風度。可知繼儒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實乃不去學嵇康表達鮮明政治立場與特立獨行，寧可學阮籍以「口不論人過」為保身之道，配合嵇康「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高士形象，在不得罪當道下，行有為之事。

綜觀繼儒行事，可知其以謹慎戒懼為主，且不似李贄、袁宏道般，會於詩文中強烈表達對政治的不滿。繼儒在詩文中少有透露對當今政局混亂的不滿情緒，反以內斂表達方式提出，平和深沈地述說自身看法。如其在〈望歲〉所言：

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  
飛蝗渡河死，耕犢似人眠，  
但問平安竹，無愁斥鹵田，  
歲星今在斗，吳越定逢年。<sup>141</sup>

詩中以淮北發生人相食大饑荒，江東則一派蝗蟲不侵、耕牛悠閒景象，人們不愁開鹽地以增稻作，只問竹子栽種安否。最後提到觀測星象時，歲星在斗宿位，吳越地方來年定是豐年。文意中似乎以江南地方繁華富庶為描述重點，然而在「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一句中，以強烈對比述說江南富庶情形，同時也對江南只關心園藝栽種，不去憂愁開拓新田地，最後一句雖在說明吳越來年定是豐年，但也可說是繼儒經由豐年之測來提醒吳越地方人民要做好準備，以免當發生如淮北一樣的大饑荒時，重蹈淮北人相食覆轍。於詩意隱晦表達其憂患意識。

另在〈移樹〉一詩中，繼儒則自述心境，以求安樂為主：

老悔浮名早，生憎見事遲，  
無書通劍客，荷鋤學場師，  
近得移花法，休使教樹知，  
俄看春彩艷，造物起我私。<sup>142</sup>

詩中表達對名聲過盛的慎懼，以及認為自身見事不明的遺憾。由此二點，似可認為繼儒理想處事態度為謹名慎事見事機敏，以保護自身為主。故詩後有學移花法時花藝草為樂的描述。而繼儒此種懼盛名與謹事行的態度實與當時謠言成風、士習浮躁有關係，也因此造成繼儒向內收斂性格。在〈閉關 其二〉一詩，繼儒則表現另一種外在面貌，藉以隱藏內心真意：

本是谷中仙，自稱谷中叟，  
床頭酒十千，籬下菊重九，  
青雀冠不簪，白羽扇在手，

<sup>141</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望歲〉，頁 12a。

<sup>142</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移樹〉，頁 14b。

客去獨焚香，高樓禮星斗。<sup>143</sup>

從文意來看繼儒似以谷中仙自許，對外自稱谷中叟，以阮籍嗜酒、淵明採菊，與頭頂道冠、手持羽扇的林下高士之風示人；又以對客清談、焚香獨坐禮拜星斗於高樓上之修真高士形象為表述。乍看之下，繼儒以清雅玄遠氣氛，營造其高士風度，彷彿繼儒為一豁達看破紅塵之世外高士。然若從詩題〈閉關〉與繼儒行事來看，可解釋成繼儒避名稱谷中叟自安；以阮籍大醉求避禍、淵明採菊以遠政治黑暗自明；雖以道服示人卻不離世，以羽扇對客清談避論時事以免落人口實。在內心謹慎心態中，以獨坐焚香禮拜星斗不開口為遠禍法門。詩題〈閉關〉可解為在政局危亂、社會動盪時，以安身保命為主，閉塵世險惡之關，用清玄飄逸形象藏避禍逃名之心。用此角度觀之，似可更貼切繼儒戒懼與圓通的處事之道。另外，詩中用阮籍、陶淵明典故，除了有高隱風度意涵外，亦包含兩者皆以眼見政局黑暗，欲避禍逃名以求全身之內涵存在。這一面亦為繼儒狷者精神中謹懼有所不為之重點所在。

在狷者有所不為原則下，繼儒雖有屢次上書當道，為民請命之舉，但其所用方法皆以冷靜分析，同時不得罪當道的安身保命下進行。在這一情形下，繼儒常託言逃名、賣痴呆以求全身。如〈花朝〉所云：

美滿春眠起較遲，五更常失杞橋期，  
愁添白髮餐雲母，戲寫青山付雪兒，  
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箋寫百花詩，  
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猷兼賣痴。<sup>144</sup>

詩中，繼儒以春眠不覺曉開頭，述說春日悠閒使人得以慵懶遲起，表現「懶」的悠閒與自適意象；再述餐雲母以修仙的修真生活，以唐寅「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為榜樣，以書寫書畫付歌姬名妓顯示灑脫外貌；最後，以暖玉棋、冷金箋表示山居閑雅生活。表面上，本詩似旨在抒發其山居生活閑適優雅之愜意，藉一連串典故運用與意境呈現表露出山居生活閑適清雅、超脫俗世之輕靈。但是，若從最後一句「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猷兼賣痴」著手，似又與其詩意中呈現優雅清閑風格有所扞格。若是從繼儒有所不為的安身精神視之，則可解釋成雖描繪山居清閑生活，然身處政局社會紛亂中，欲效睡仙陳搏以睡待世；因愁時局而添生白髮，欲以餌食仙術修仙置身事外；用戲寫青山賣，不使造業錢的遊戲人生態度以表心中無奈處；最後明白欲求長生平安於世，只有以猷、痴外貌處事以遠禍。

此處「猷」、「痴」當理解成繼儒賴以保身的處世方針。痴字，有痴迷、憨呆之意，明人習把癖、痴、癡三者並用，泛指沈迷事物的狀態，故痴字可指繼儒欲

<sup>143</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閉關 其二〉，頁 18b。

<sup>144</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1，七言律詩，〈花朝〉，頁 1a~1b。

以山居書畫營造藝術生活的理想鄉，以其眾多癖好求脫離俗世紛擾以保身，這可從其大量山居詩、田園詩看出。以寄情外物，遠離當世紛亂政局求明哲保身。而獸字則有隱含藏拙之意，以口訥面樸外貌示人，心懷戒懼心態，口不擇人過，用隨和憨厚態度處世。

綜上所述，繼儒因時局日益混亂，心懷出世之思，但心中仍有憂患時事之念，故藉寄情外物的「痴」試圖尋求自身在出處之間的位置；又用隨和藏拙的「獸」行濟時救民之舉，以消除心中空有濟世情懷而無法展開的焦慮感。加上萬曆中期以後，童心說、性靈說強調真心處世，以自適為目標，使繼儒「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得到共鳴與發展，形成以「痴」、「獸」二字尋求自適生活與自身定位的處世方法。

在獸痴處世態度下，繼儒對時事關懷不以慷慨激昂為尚，反以冷靜旁觀為主，如〈過東林有感〉即以過東林書院抒發黨爭一事的感慨：

城隅歸羽夕陽時，不是深秋也自悲，  
川上水流君子澤，窓前草護黨人碑，  
魚龍混雜元難辨，玉石俱焚祇為誰，  
獨有草堂三四柳，殷勤枝葉向東垂。<sup>145</sup>

詩中以感傷語調述說夕陽下座落城隅的東林書院，在黨人遇捕，碑前雜草以掩埋黨人碑，獨留書院外江上水流如君子德澤川流不息。面臨如此荒蕪景象，使人產生似深秋的哀傷感。對於東林諸君所遇情狀，繼儒於感傷之餘，也明白瞭解到此種意氣之爭，造成良莠不齊有投機者趁時混入其中。最後，於詩末發出「玉石俱焚祇為誰，獨有草堂三四柳，殷勤枝葉向東垂」之感語，表示雙方玉石俱焚只為誰？一開始都是抱著濟時熱心，只是隨著立場不同而紛爭愈加激烈，導致玉石俱焚罷了！以草堂三四柳喻東林剩餘者，說明其仍心懷熱誠向君王所在東方等待救世機運。可見繼儒對時事有深厚瞭解，並在詩文中流露一股憂時感懷的真性情。然而，若與李贄、袁宏道等近狂者心態士人相比，則繼儒于詩中表達的仍為對時局的感傷，多了感性卻少了一股激情，少有抨擊政府蠹政言行，屬有所不為的退縮型狷者心態。

另在〈避暑〉一詩中，亦有感懷時局紛亂，欲退縮求自保之語：

避暑閒逢谷口樵，負薪城裏到家遙，  
大都陳粟如珠玉，也有新聞說市朝，  
行雨龍猶潛洞壑，食人虎豈問賢豪，  
是非聒耳何時靜，我欲風前擲許瓢。<sup>146</sup>

<sup>145</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1，七言律詩，〈過東林有感〉，頁 29a。

<sup>146</sup>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1，七言律詩，〈避暑〉，頁 30a。

詩中說到自身巧遇谷口樵，邀返家談話，以京城米價騰貴，時事新聞的談說，感嘆及時濟世的行雨龍賢才猶蜷伏草莽，未被發掘；暴政如猛虎食人般，不論賢豪一律受到欺凌。面臨此種政局，繼儒感嘆是非攻訐何時能平靜，以許由掛瓢典故為例，說明自身欲隱居遁世的念頭。這透露出既有說市朝關懷時事之舉，但亦有許由掛瓢的隱世衝動，表達繼儒對出處懷若即若離之關係，呈現出繼儒有所選擇的狷者精神。

## 小結：

最後，本文藉由描述繼儒清閑與戒懼這兩種心態，帶出繼儒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並透過繼儒自身文集與李贄、袁宏道文集和其餘相關資料，道出由狂者向狷者心態變化的軌跡。綜合李贄到袁宏道至陳繼儒三人代表的心態及其所暗合的部分士人潮流，可見一股由狂者到狷者轉化的心態流變。大抵變化實與當時社會經濟、政局變動相互動。由李贄代表的狂者積極精神，一方面體現王學固有的狂者高度自信與濟世情懷；另一方面則體現於因社會經濟持續轉變，人心奔利，出現許多山人、講學家汲汲營利的局面，使有抱負士子期以改善世風；又因皇帝長期不上朝但仍有絕對權力，使首輔須揣摩上意勾結宦官以鞏固自身權位，形成柔媚持政，朝政混亂局面。面臨此種情形，士人由於尚有濟世熱情，加以王學激發，使李贄體現的狂者胸次呈為一時潮流。

隨著萬曆中期以後，政局日益混亂、朝中黨爭已見端倪、閣部御史不和等等，加上社會上謠言四起、輿論氾濫、所謂假山人與假道學四出奔利，使士人中有部分萌生退隱避世之念。加上李贄以異端之名被逮至京師自縊身亡，與張居正死後遭皇帝無情清算，使濟世進取的狂者精神受到士子懷疑。既然明君不在，那自身價值將何去何從？此乃萬曆朝中士人所遇的困惑，故有袁宏道自適與癖好闡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自身經營，在仕隱矛盾中轉以注意自身自適為主。雖然當中仍有仕隱矛盾的苦悶與自身定位的焦慮感，但以不再以狂放進取、無畏世人目光的勇氣行事，而是漸向安身立命靠攏。

到了陳繼儒時，由於朝政日趨惡化，社會世風亦愈加澆薄，士人處在是非不明、唯利是圖的年代之中，由於新舊價值尚未確立，加以內憂外患不斷，興起避世保命念頭。故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獨善其身精神引起此時士人共鳴。隨著士子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靠攏，出現了沈迷自身逸樂而不理時事者，亦有假藝術生活塑造，以寄託自身避世念頭；同時利用自身影響力上書當道，以博得社會良好聲名者。

當中，以繼儒所行最為成功，達到真正以自適為理想，完美於出世濟世間找到絕佳平衡點，使心態達到平靜、調和，對自身聲名追求與社會時事的真心關懷，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為依歸，成功於處世上扮演各個角色，形成繼儒多樣面貌的特色。可說由狂到狷的心態變化，體現明中後期一連串的政治社會變化的軌跡，也記錄了士人於當中如何摸索自身定位的轉變。同時由於此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

者心態引發士子共鳴，故繼儒的得享大名實與此種共鳴有所關連。